

本书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文化发展制度的概况、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作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本书认为亟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制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制度。本书分别从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的改革三个层面对上述制度展开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制度研究

胡剑 ◎ 编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WENHUA FAZHAN ZHIDU YANJI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制度研究

胡剑 ◎ 编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WENHUA FAZHAN ZHIDU YANJI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 / 胡剑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43-3856-5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文化发展 - 制度 - 研究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7809 号

责任编辑 吴明建
封面设计 严春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
胡 剑 编著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610031)
发行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1
字 数	196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856-5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引言

文化是中华民族存在、延续、发展的灵魂。中华文明八千余年，从凿石为斧的初级加工阶段，到瑰丽华美的不朽诗篇，文化一直延绵不绝地发展着，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沐浴在这种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中，汲取着各种精神养料，又以自己的各种社会实践发展着这种文明。中华文化正如奔流于千山万壑的江河，滚滚洪流，浩浩而来，虽遇险阻，冲决向前。虽然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遇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之下的中华文化正在实现的转型、变更、创新，更为世人所瞩目。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中断过自己文化的文明古国。自古迄今，除中华文化外，尚没有一种文明，一种文化能够延绵几千年而从未间断，这足以证明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强烈的感召力和强劲的创新力，也不能不激起每一个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敬仰和向往。

在当今世界的格局中，文化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消解，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直接对抗的时代告一段落，然而在总体呈现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下，冲突和矛盾，甚至战争，仍然不能避免，在某些特定的时空甚至愈演愈烈。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文化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凸显，文化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最危险的方面将源于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实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西亚、北非一系列动荡、政变的原因之一，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同时，文化不仅是产生冲突的源泉之一，也是形成团结的旗帜和重要力量。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成为分裂的力量，又成为统一的力量。同一大文化范畴内的各政治体在走向融合，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其他一些基于相似、相近文化的地区也在加快合作、交流、融合的步伐。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当代中国进入了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我国

文化在曲折中求发展，但是这段时期总体处于文化的震荡期，并没有成型的文化发展制度出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项事业得到普遍发展，文化建设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文化建设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为世人瞩目，实现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面的奇迹，文化建设也是成绩斐然，但相比于经济建设成就而言，文化建设成就稍显逊色。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文化将如何继续保持前进的方向，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系统。如何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建设的新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文化先进性？在社会思想多元化、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的今天，如何既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又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指导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时代的文化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体现出其特别的规律性。这就需要在文化层面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系这一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提出，做出了重要部署，对在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①

①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成果以全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今后我国文化建设的指南。在新的形势下，文化发展将继续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将成为民生事业的重要方面。这使得针对文化发展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目标之一，这就更加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目 录

第 1 章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文化制度的概况及其借鉴	1
1.1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	1
1.2 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	12
第 2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的建立	17
2.1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	17
2.2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	20
2.3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	25
2.4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	32
2.5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	35
第 3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制度	40
3.1 文化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40
3.2 文化发展规划原则	47
3.3 文化发展规划具体制度的改革	57
第 4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制度	63
4.1 文化发展评估的理论基础	63
4.2 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67
4.3 公共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71
4.4 文化发展评估具体制度的改革	77
第 5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制度	89
5.1 文化发展反馈的理论基础	89
5.2 文化发展反馈原则	99
5.3 文化发展反馈具体制度的改革	101

第 6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制度	110
6.1 文化发展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	110
6.2 文化发展保障原则	115
6.3 文化发展保障具体制度的改革	119
第 7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制度	140
7.1 文化促进的理论基础	140
7.2 文化发展促进原则	144
7.3 文化发展促进制度的改革	147
参考文献	161
后 记	167

第1章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文化制度的概况及其借鉴

文化是人类的特有现象,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特征。文化发展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中外各国概莫能外。人类的文化发展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无止境地向前。和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一样,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各国人民在本国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发展思想,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发展制度。

1.1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

中国古代文化辉煌发达,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文化,形成了文治为先、以文化人的文化发展思想。在文化发展制度方面,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以官为本、官私结合的文化教育体制和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发展制度。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具有突出的政治性、超强的稳定性和浓厚的教化性。

1.1.1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思想

1. 文化发展目的:以文化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文”与“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汉代刘向最早将“文化”二字连用。从那时起,文化就成了文治教化之总称,与今人的文化概念已相差无几。这意味着,中国非常重视文化对人的塑造。历代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阐述了以文化人的重要性、必然性。

儒家始祖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他指出不同的个体的天性差别不大,但是后天在社会中的行为却相差甚巨。孔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释。他指出,除了极个别不肖之人是无法改变的,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教化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因此,孔子提出“有教无类”^②的思想,主张通过文化教化人民。对于怎样通过教化达到理想人格,孔子的回答是“克

^①《论语·阳货》。

^②《论语·卫灵公》。

己复礼”。“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复礼”是把不合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显然，在孔子看来，庞大的礼制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塑造合乎礼的规范的人，就是说，文化可以实现人的行为的规范化，人的情操的高尚化，社会秩序的合理化。

在孔子之后的荀子和孟子分别从不同的立场阐述文化对人发展的重要作用。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①在这段论述中，荀子指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要从君主权威、礼义、法律等几个方面规制人天生的恶，使之归于善。荀子还特别强调了文化的功能，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②荀子认为人性与文化须臾不可分离，它们的结合是必然的。人性是材料，文化是对材料的加工。没有加工的材料是不合格的材料，甚至是危险的材料。不与人性相结合也显示不出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只有将“文理隆盛”之力加之于人性之质上，便可克服人性之丑恶，达到人性之美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用文化塑造人的典型过程。荀子还详细阐述了这个加工过程，将其描述为：“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③他指出，文化对人的刻画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循序的过程。

孟子持有与荀子截然不同的人性立场。孟子认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④人的“仁、义、礼、智根于心”，无须外在加之。既然人性如此完善，何以社会丑恶盛行，何以面对事实上存在的某些人的恶劣现象？孟子认为，这种善性只是人性一种天生的、初始的状态，而社会污浊，天生的善性在社会中无法躲避污染，要想保持这种天生的善，就非施文化之功不可。理想人格非得文化不得保持。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

①《荀子·性恶》。

②《荀子·礼论》。

③《荀子·七法》。

④《孟子·告子上》。

于得也，求在我者也”^①。这就意味着，人要真正达到善，还得靠文化去指导那种自我修养。事实上，孟子的以修养而使善的天性成为现实的说法，本身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文化人”的重要思想基础。^②

殊途同归，虽然儒家各代表人物立场不一，但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对文化的教化功能表示高度重视。儒家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文教追求人性的完善，追求人格的高尚，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思想之一。

2. 文化发展地位：文治为本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很多朝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优先于其他治理手段而适用的。“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③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文德”“化成天下”。自西周开始，统治阶级就开始在社会上加强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西周统治阶级虽以武力消灭商纣，但自建国伊始，就认识到文化对社会的巨大教化作用，就开始着手制定维护社会秩序的礼。礼是关于君臣贵族、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规定，关于贵族的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和法律制度的总称。^④西周统治者对礼的社会政治作用高度重视。“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⑤西周统治者将礼运用到教育、司法、人伦、军事、宗教各个领域，将礼视为治国的首要方略。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十分欣赏周朝以礼治国、文治优先的政策，他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现状及其产生的社会动荡、秩序荡然无存的局面使儒家将对礼法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号召诸侯各国放弃暴力征伐、武力治国的方略，恢复到周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黄力之：《论毛泽东的“以文化人”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12。

③ 《说苑·指武》。

④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7。

⑤ 《礼记·曲礼上》。

⑥ 《论语·八佾》。

代那种文治的状态。春秋战国之后的历史也反复说明,偏重于文治的时代是政治较清明、社会较稳定的时代,偏重于武治的时代是政治较黑暗、社会较动荡的时代。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也引起了后代历朝统治者的重视。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体现了对暴力治国的厌恶。秦之后的统治者逐渐得出“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结论。文武并用且以文治为本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共识。

1.1.2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1. 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

中国文化起源较早,自奴隶社会开始就有了专门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员,有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在夏朝,文化教育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六卿政务官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①不过在奴隶社会,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化管理体制。自秦汉时起,中央政府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从行政制度方面看,设官的记载最早见于夏朝,到秦朝时才首先形成了九卿和尚书制度,第一次有了各衙门较明确的分工,并使九卿和尚书(后来发展为六部)制度成为封建社会主要的行政制度固定并延伸下来。^②文化教育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各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各朝都有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文化事务。各朝对文化事务的管理有几个特点:其一,中国各朝对文化事业的管理非常广泛。中国古代并没有对文化、教育、考试、祭祀、宗教进行非常明确的分工,往往将对文化的管理体现到对教育、考试、祭祀、宗教等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所以文化管理部门往往也统掌着教育、考试、祭祀、宗教等事务。其二,中国各朝文化管理在中央层面呈现出集权倾向,在地方体现出分权倾向。中国在历史上是封建制度极为发达的国家,从秦朝至明清,都是建立起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是地主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国家的代表,享有绝对而至上的权力。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总体呈现出集权化的倾向,所以,在中央层面对文化的管理是集权的,在一些朝代,君主甚至直接管理文化教育具体事务,直接制定文化教育具体制度。皇帝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最高统治者直接管理文化事务的表现,也是在中央层面文化管理呈集权状的表现。

^①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② 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2。

其三,中国古代各朝文化管理在地方层面上呈现出分权倾向。这里指的分权并不是指中央集权政府对地方文化管理事务不闻不问,也不是指中央集权政府对地方文化管理事务没有能力管理,而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发展不均衡,加之中国地方宗法势力较强,地方宗法组织对社会基层事务(县以下的村社级)有了广泛的影响力,所以,基层的文化管理较多地由地方宗法组织承担。

2. 以官为本、官私结合的文化教育体制

教育活动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夏朝开始出现专门的教育机构。《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这里的“序”起初是教射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奴隶主贵族一切公共活动,如议政、祭祀、养老的场所,也是奴隶主贵族教育子弟的场所。^①夏朝开始至春秋之前,学校成为贵族子弟才能进入的场所,教育成为贵族子弟才能享受的特权。但在春秋时期,由于世袭制度的弊端、奴隶王权的衰落及战争造成的大动乱状态,造成官学开始衰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出现,私学开始兴起。孔子即是兴办私学的代表人物。孔门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说明当时私学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产生了非凡的社会影响。其他春秋诸子都开门授徒,影响广泛。从春秋战国起,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呈现出以官学为主,官学私学相结合的特征。从此,官学和私学成为我国文化传承的两条线,私学在各朝各代都有发展,尤其在宋、明、清时达到高峰。与官学相比,私学的特点非常明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依靠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以适应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②

官私结合的文化教育体制对促进我国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第一,私学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自由,促进了学术多元。私学相对于官学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各家私学的思想与官方思想不一致,各家私学不必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在私学办学的实践中,各家各派都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思想就是从私学讲学中发展得来的。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就是宋朝两大私学学派创立的。第二,私学形式简便多样,扩大了教育受众和文化主体范围。总体而言,官学的入学门槛较高。虽然历史上的官学也招收一些贫寒百姓中的青年才俊,但苛刻的条件经常让贫家子弟望而却步。如西汉太学

①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②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设立时,太学生的来源有两途: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妆端正者50名;二是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标准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①后来的中央官学的入学条件虽不像西汉初期严格,但是对于一般百姓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中央官学如此,地方官学的入学门槛虽较中央官学低,但其招收人数仍然极其有限。私学没有官学那样的经费保障,也没有官学那么苛刻的招生条件。私学的教学理念和招生条件与官学不同。私学大师、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明确地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人们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他的弟子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藜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的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②当然,孔门弟子中也有出身商人和贵族的。私学也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它以教师为中心,可以流动,如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③。私学的教学设备较简单,教育教学制度从总体而言也不如官学规范,但它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可见,官学虽没有严格地将贫寒子弟排除在受教育的范围之外,但其教育对象和文化受众是有限的。而私学却具有形式简便多样、教学理念先进的特点。正因为如此,私学的教学范围很广泛。很多私学都是“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这对扩大文化主体范围,增加中华文化的传播力起到极大的作用。

3. 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发展制度

孔子确立了以礼教秩序、伦理规范为主的儒家学说体系。西汉时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欲树立儒家学说之独尊地位,建立起以儒家礼教伦理组织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社会。从汉朝汉武帝时期起,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此,这一以伦理纲常为主体的学说体系得以倡行。汉之后,儒家学说虽然屡遇冲击,甚至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总能在困境中求生存,在挫折中求发展。儒学与其他学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以儒学与道学、玄学、佛教相融为例可见一斑。佛教在西汉末进入中国,在其进入中国之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宣扬“灵魂不死”“因果报应”成为其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兴起,佛教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因为玄学讨论的中心是“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

①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6。

②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2。

③ 《孟子·滕文公下》。

学的中心问题为“空”“有”，与玄学比较接近，于是两晋的“名士”与“名僧”互相标榜，大有“玄”“佛”合流之势。此时，总的倾向是佛教依附于玄学。但此时的佛教已出现中国化的倾向。佛教也没有放弃自己思想体系的独立性，努力进行本门思想的发展与本门思想体系的构建。随着佛典翻译的系统化，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出来，佛教发展碰到的困境是如果尽显自身思想的独立性，就会在中国水土不服，不能深入人心；如果尽弃自己的思想体系，就会完全成为其他文化思想体系的附庸，丧失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自隋唐以后，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中国化。而儒学博大的思想体系、宽容的文化心态和广阔的思想平台也可以容纳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这些中国化的佛教派别在佛性问题上已经不同于原始传入的佛教，实际上它们已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佛教由两汉末传入中国，到隋唐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从一种异质文化转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可见，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总是以中国的学术体系为依托，并且在儒家化之后获得大发展，最终佛教改变了其传入中国时的初始化形态，成为融合之后的儒家化的佛教。这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各种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过程，也反映出儒学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它可以对其他各种思想进行锻造，给其他各种思想提供发展平台。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但儒家作为中华文化发展主要方面的地位在近代以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根本动摇。这是由儒学具有的强大容纳整合功能决定的。应当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中，儒家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也要承认，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反相成的东西，有很多复杂的情况。^②

1.1.3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的特点

1. 突出的政治性

中国文化承担的政治功能极其繁重。文化一直被作为维护阶级统治最重要的工具。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学派就突出地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学习不是为了纯粹的学习，文化也是为了实现治国的文化。《大学》开篇也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

① 姜林祥：《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J]，《齐鲁学刊》，2006（1）：8。

②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8。

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①可见，身心的修养、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培养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定国安民，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一种很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政治抱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投身仕途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中国历代统治者多极其重视文化的政治功能，故文化附属于政治的现象非常普遍。历代统治者选择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多从维护自身统治秩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儒学出现伊始，并不待见于统治者，但随着儒学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逐次显现，统治者认识到儒学是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和文化法宝，对待儒学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极力提倡的文化思想。佛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佛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刚传入中国时，也不被统治者重视，但当统治者发现佛学宣扬的忍受克制、逆来顺受思想可以作为麻痹被统治者的思想工具时，佛教就被鼓励和提倡起来。

2. 超强的稳定性

这里的稳定性既指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指由这种文化发展制度组织起来的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与中华文化的稳定结构有较大关系。反之，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形成了较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建立在这种文化之上的文化制度也具有较强的稳定特性。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伦理文化，它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秩序为己任。儒家提倡道德，主张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尽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儒家认为这种道德的修为可以实现社会等级的有序。儒家承认并不懈地宣传君臣上下贵贱亲疏的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认为用以协调这些等级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根植于天理、发自内心的。所以，儒家坚定不移地主张实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人伦道德。同时，儒家又认为，社会各个等级间处于激烈的冲突对抗状态是不对的，理想的社会是应该

^①〔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6。

既有等级之分,又有各等级间和谐统一状态。所以,儒家又主张天人合一,主张实行一些能够沟通社会各个等级的制度。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衍生出来的科举制度、职官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乡约制度、名田制度等十分完备。儒家主张通过实行这些制度,实现各个等级之间有限、有序的流动,以达到各等级之间和谐稳定的状态。可见,儒家文化以封建人伦道德为核心,而封建人伦道德是一个不能随意变动的根本规范,建立在这种文化思想基础之上的文化发展制度必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化管理制度、学校制度及与这些基本文化制度相关的科举制度、职官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乡约制度、名田制度、宗法制度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儒家文化及儒家文化发展制度对维持封建社会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虽多次更替,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主导文化、儒家文化发展制度作为主要文化发展制度的状态却没有根本变化。这证明,儒家宣传的这套封建社会纲常伦理很适合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实际情况。它不仅适用于一个王朝的统治,同样也适用于颠覆旧王朝的新王朝的统治。由于王朝的频繁变革,由于土地私有者之间的变化,由于科举、举荐制度的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不是恒定不变的,王侯将相与布衣黎民在社会大动乱年代可能身份会发生转换。但儒家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却沿袭下来。“器可变而道不变。”王朝可以倾覆,官僚机构可以易人,君臣、臣民、贵贱、上下可以易位,但君臣、臣民、贵贱、上下的等级秩序则是亘古不变的。^①另外,儒家主张爱民、节制、仁政、重义。这对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意义。这些文化思想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被统治阶级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也自愿地接受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接受相应一系列文化制度的规制。历史证明,在中国古代,凡是较认真地按照上述儒家文化主张,建立起较完备的儒家文化发展制度,并较严格地施行的朝代,社会才较稳定,社会冲突才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王朝就能比较长治久安地延续下去。一旦废除儒家这些文化主张,视科举制度、职官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乡约制度、名田制度等文化制度为空文,社会就较动荡,这个封建王朝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3. 深厚的教化性

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具有深厚的教化性。这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优点,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即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儒家文化的具体内容发生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0-131。